



# 让云冈纹饰更多融入现实生活

## 《云冈纹饰全集》衍生资源开发交流会举行



交流会现场

本报讯(记者 赵永宏)9月2日下午,青岛出版集团与云冈研究院召开《云冈纹饰全集》衍生资源开发交流

会。云冈研究院党委书记刘建勇,党委委员、副院长何建国,党委委员、副院长闫丁,云冈学专家、研究员王

恒,云冈学专家、研究员赵昆雨,以及青岛市委宣传部、青岛出版集团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议。双方就《云冈纹饰全集》出版发行和衍生品合作开发等事宜进行了洽谈。

《云冈纹饰全集》以云冈纹饰研究的历史存录为宗旨,探讨云冈纹饰的粉本原型,全面研究云冈纹饰的谱系发展规律,系统梳理外来文化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发展轨迹,填补了云冈石窟纹饰造型体系研究的空白。编绘《云冈纹饰全集》的目标不仅要将对美术研究成果进行视觉转换,还要将云冈纹饰转化为文创设计,融入现实生活。

双方认为,《云冈纹饰全集》中的纹饰图案可以应用于各类文创产品,具有较高的市场潜力。双方将探索新的合作模式,以实现优势互补,共同推



《云冈纹饰全集》

动云冈石窟文化资源的挖掘与利用。此次交流会的召开,有助于推动《云冈纹饰全集》衍生资源的开发,进一步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

# 2024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 网络文明国际交流互鉴论坛召开

## 杭侃作主题演讲《云冈的传承与创新》



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作主题演讲

本报讯(记者 赵小霞)8月29日,2024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网络文明国际交流互鉴论坛在成都举行。与会嘉宾围绕“推动交流互鉴 构建共同愿景”畅所欲言,共话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交融共生的美好未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研究生导师、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在论坛上作了题为《云冈的传承与创新》的主题演讲,介绍了云冈石窟文物保护与现代科技交融的故事。

杭侃说,云冈石窟景区去年的参观人数为303万,今年8月21日,参观人数就超过300万,其中青年学生的参观人数不断增长。遗产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对其实出普遍价值的认可,《世界公约》的主要任务是确保遗产得到保护并传承给后代。分享和传播是世界遗产的两大中心任务,但要确保所有人,特别是年轻群体能够真正接触到并热爱这些遗产,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为此,我们通过一系列的传承与创新实践,真正实现文化遗产人人保护,保护成果人人共享。

“传承和创新的前提是保护,云冈石窟开凿于侏罗纪的砂岩体上,经历了1500多年的岁月洗礼,有许多病害需要我们防治。”杭侃介绍,云冈研究院除了在病害分析和保护材料研制方面加大科技投入之外,也与时俱进,在2001年成功申报世界遗产之后,就开始了数字化保护的探索,2020年,建成了“数字云冈先进计算中心”一期,是全国文物系统首个先进计算中心,为云冈石窟的数字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杭侃介绍,“如果仅仅展出考古发掘品或者一些图片,不足以让大家感受到云冈石窟的体量和震撼。借助于3D打印技术,我们等比例复制了云冈石窟的第12窟,丰富了云冈石窟艺术‘行走’世界的手段。3D打印、XR、H5等新兴技术与高精度云冈石窟数据相结合的新场景,为人们感知传统文化魅力增添了更多打开方式。”当历史的尘埃散去,北魏王朝开凿的云冈石窟艺术价值愈发彰显。数字化技术的运用,创新了传播手段。

# 学术力量与云冈文化的碰撞

## ——“北大遇云冈”主题文创店小记

本报记者 赵小霞



“北大遇云冈”主题文创店开业剪彩

当北大遇上云冈石窟,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多年来,双方在文物保护、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诸多合作成果。为了将北大学术研究成果与云冈石窟的历史文化魅力进一步融合,双方以文创为载体,打造了“北大遇云冈”主题文创店。9月3日,该主题文创店在云冈博物馆正式开业。

开幕式上,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致辞。他说,云冈石窟的定位,不仅是一个景区,游客到此也不应该是走马观花式地观赏。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分享和传播是其两大中心任务,但要确保所有人,特别是年轻群体能够真正接触到并热爱这些遗产,需要更多鲜活恰当的载体。文创,恰是联接景区和游客的人文媒介,是实现“让文物活起来”的重要手段。

北京大学会议中心主任胡新龙在开馆仪式上说,北京大学与云冈石窟有着深厚的渊源,一方面,对于云冈的保护和研究,北大一直走在前列。北



“北大遇云冈”主题文创店

大考古系第一任系主任宿白先生,是云冈学的实际奠基人。杭侃作为宿先生的入室弟子,三十余年来,始终致力于云冈石窟的研究、保护和宣传,培养了大批后继云冈学研究者。另一方面,学校加强引导,越来越多的北大年轻人成为云冈粉丝,每年暑期都有大批北大青年学子选择到云冈学习交流。

走进云冈博物馆,“北大遇云冈”主题文创店设在进门的左手边,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店中庄严肃穆的第20窟木雕大佛,店里的文创产品琳琅满目,有文物修复宝盒套盒、云冈纸雕灯、飞天冰箱贴、书法扇子、云冈元素帆布包、云冈文化相关书籍等。在云冈博物馆,游客纷纷被这些文创产品吸引,有的在翻看云冈相关书籍,有的在看云冈元素手串,有的在浏览各个文创产品,刚开业就迎来了如潮的游客。一位来自河北石家庄的游客说:“前不

久,我在北大参观了不少文创店,此次在云冈石窟看到了‘北大遇云冈’主题文创店,感到十分亲切,漫步在这里,我感到这是景区文创、大学文创、博物馆文创的集合体,文创产品的创新设计以云冈学术研究成果和北京大学创新精神为基石,多领域、多维度地宣传和展示了北京大学多元文化和云冈石窟历史,通过这一主题文创店,我们看到了云冈石窟的时尚魅力,也看到了北京大学文创的创新活力。”

云冈博物馆相关负责人说,北大文创人驻云冈石窟,为云冈文化的展示和传播注入了新鲜血液,让游客可以在云冈看见北大,让师生可以在北大看见云冈,不仅传达北大的精神气质,也传播云冈的厚重底蕴,在大学教育和博物馆教育之外,促进公民终身学习,共同促进文化遗产人人保护、保护成果人人共享。



“书籍小夜灯”文创

# 关于云冈石窟景区 调整开放时间的公告

尊敬的广大游客:

按照大同市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领导小组要求,结合云冈石窟景区旅游实际,云冈研究院决定从9月5日至9月30日景区开放时间调整为每日8:00至18:00。其中,为方便游客出行,中秋假期(9月15日至9月17日)景区开放时间为每日7:00至18:00。

请广大游客出行前及时关注景区官方公告,合理安排行程。特此公告

云冈研究院  
2024年9月4日



# “上博”里的云冈面孔

许玮

甲辰初夏,闲来翻阅手机,偶然看到一条题为《上海博物馆东馆里,有从日本追索回国的云冈石窟造像》的链接,顿时来了兴致。

在云冈石窟担任兼职讲解员的这几年,每遇有关云冈的文章或报道,我都会留意,尤其对云冈流失文物,更是分外关注。上海博物馆东馆藏有云冈石窟造像,或许云冈的研究专家早已知晓,但我是头一次听说,便赶紧点开浏览。

原来,陈列在上海博物馆东馆古代雕塑馆的这些云冈造像,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从日本追索回的一些云冈雕刻残件——有佛头像、有菩萨像、有小

龛佛像、有供养天人像,还有动物雕刻、石背光残件,展出十三枚,大小不一,有的还不及巴掌大。关于这些残件的流失和回归,牵涉到日本侵华期间的文化侵略和文物掠夺。

1937年9月,日军占领大同后,组织了一支由摄影、测绘、墨拓、录文等各方面人员组成的调查队,以水野清一、长广敏雄为主,对云冈石窟进行调查,并出版了一系列学术专著,尤以1951年至1956年间陆续出版的《云冈石窟——公元五世纪中国北部佛教石窟寺院的考古调查报告》(16卷、32本)影响最大。

据“上博”展陈资料介绍,这些云冈

造像残件,是水野清一和长广敏雄等人,当年在清理云冈“昙曜五窟”(今第16窟—第20窟)窟前土层时获取的。“昙曜五窟”是由北魏中期佛教领袖昙曜高僧,于文成帝和平初年(公元460年)得到皇室支持与委任后开凿的,分布在今云冈石窟中部窟群偏西区域。五窟相互毗邻,形制基本相同,皆为雕凿大佛的穹窿窟,是云冈石窟开凿时间最早、规模最大、系统性最强的洞窟群。

水野和长广所获取的这批云冈残件,抗战胜利前被运往日本,收藏于京都的东方文化研究所,而且,不唯云冈石窟造像,其他中华文物也在抗战胜利前被大量运往日本。抗战胜利后,经我国文化学家李济、张凤举等先生不懈努力,云冈雕刻残件于1948年被追索回来。新中国成立后,遵照中央政务院和上海市人民政府的批示,1955年,这批文物入藏了上海博物馆,从此“栖身”沪上。

李济先生是著名的人类学家、现代考古学家,被誉为“中国考古学之父”。“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他和同仁们舍命护送故宫文物“南迁”,留下了时代的佳话。张凤举先生是著名作家、文史学家、批评家、翻译家,早年曾留学日本京都帝国大学。作为在文史等多方面有造诣的大家,他们两位深知云冈石窟在中国雕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尽管流失到日本的是些雕刻残件,但仍极力追索,体现了抗战时期国人对中华瑰宝的

守护,以及对日本军国主义掠夺的抗争,在云冈石窟的保护史上,留下了感人至深的一笔。

我把“上博”收藏有云冈石窟造像残件的事,说给上海的朋友杨磊,和我一样,他当即流露出浓厚的兴趣,说一定去看,而“上博”东馆距离他生活工作的地方不算远。杨磊热衷于历史文化,2021年秋天,他和朋友来大同参访云冈石窟。那次,我很荣幸给他们做了讲解,并成为好友。

不久,杨磊便去了“上博”东馆参观,很快给我发回了照片。如文前所述,这十三枚残件确实比较袖珍,个别造像脸部有残损,均为砂岩质地,与云冈石窟博物馆所藏小型雕像类似,特别是小龛佛像,和“昙曜五窟”外立壁现存的小龛佛像一样,而展陈的背景,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昙曜五窟”的旧影。从风格来看,这些残件均属云冈早期作品,为石窟第一期造像,透着明显的西域风格,比如,天人发髻高耸,佛像开脸饱满,五官比较集中,迥异于后期的秀骨清像,但微笑洋溢在眉间,是云冈永恒的标志。

从被带往海外到回国,直至今,时间已经过去80多年,虽然这些雕像的表情依然鲜活生动,但很难判定它们是当年被有意盗凿,还是日本调查队在考古时清理土层所得,不过,不乏历史上因某些石壁崩塌而坠落的残件。展陈资料说,这些残件追回来后,曾长



期存放于“上博”库房,被遗忘了几十年,能重新面世,无疑向观者翻开了一部遥远的云冈史和北魏史。

与“上博”展出的大体量雕刻作品相比,云冈的这些石雕残件并不引人注目,但对云冈石窟而言,它们是一个个“走失的孩子”,在静默无言中,倾听着颠沛流离的凄楚。杨磊说,与这些残像相对,眼前浮现出那年参访云冈时的情景,而且,造像脸上呈现的,一看就是熟悉的“云冈的微笑”,迷人而温婉,含蓄而内敛,既有历史的辉煌壮阔,也有岁月的沧桑流变。

散佚到日本的中国文物到底有多少,恐怕很难给出确切的统计数据,但查阅孟国祥先生著《大劫难——日本侵华对中国文化的破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一书可知,日本在战后归还了一部分从中国掠夺的文物,其中有2000多件属较为珍贵的文物。

我想,纵然家山路远,归国的这些云冈雕刻残件没能回到云冈石窟,但在有识之士的努力下,“游子回家”,洗刷了漂泊海外的耻辱,总归是一件幸事,而能在尘封的历史中与观者见面,更是对李济、张凤举等“护宝功臣”的告慰吧。



上海博物馆里的云冈造像